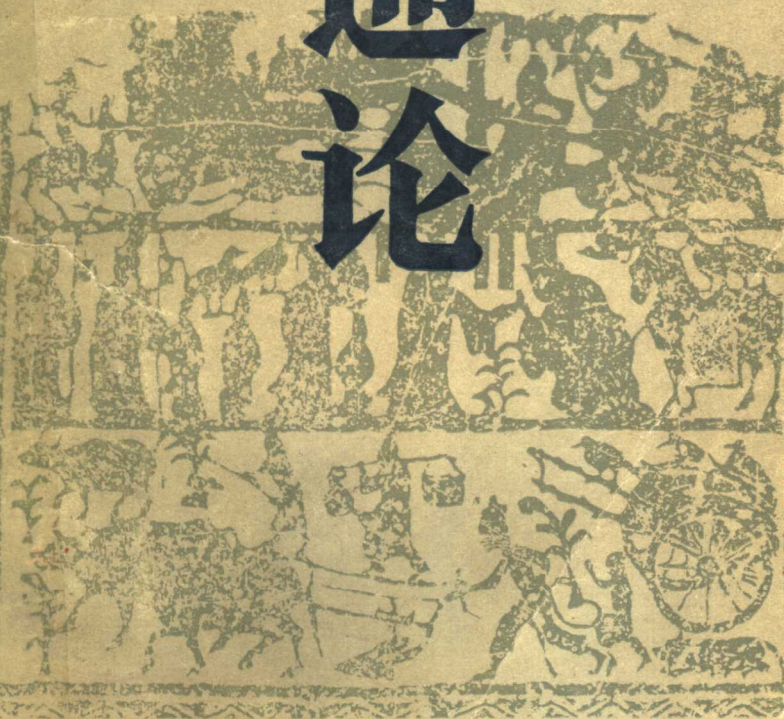


高等师范学院函授教材

# 史记通论

韩兆琦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函授教材

# 史记通论

韩兆琦 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函授教材

**史记选论**

韩兆琦 等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怀柔县东晓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2千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500

---

ISBN 7-303-00989-2 / I · 62

定价: 1.90 元

文辞较做点功夫后之见解  
时代影响。 地位 羽林思想  
P.10(64)  
P.13(世界)

以史义P.4

## 前 言

二十多年前在复旦大学当研究生时，按照蒋天枢老师的意见，我用较多的时间读了前四史，当时我对此并没感到特别的急需，但在毕业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逐渐地、越来越突出地感到了它的重要。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种读史的兴趣，对于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史，以及各种野史、笔记等，总是有机会就读。而在教学和进行科研活动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有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注意研究这些作家作品与当时时代环境的关系。我认为，《史记》是先秦文化的总结，是研究西汉前期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它又是代表汉代最高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它不论在历史学还是文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各部门学科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各门学科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掌握了它就可以触类旁通地理解历史学、文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许多问题。因此引导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人下点工夫读《史记》，我认为是值得的，而且不仅限于文科。]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从1979年起我给中文系研究生开了《史记》课，随后于1981年又给中文系本科开了《史记》研究课，紧接着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也把《史记》列为了中文系本科自学考试的选修科目，师范大学校内的其他文、理科各系同学也纷纷报名选听，而北京市的其他高校如国际政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以及各种夜大、电大、老人大学等也都相继或邀我讲课，或邀我作报告，十多年来，北京地区学《史记》的盛况空前。不仅如此，随着师范大学函授教育的开展和国内学术的交流，我们这门课程已经先后开到

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南等省去了。

要开课就要有相应的教材，为此，我们首先编写了一本《史记选注集说》，此书于198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使用过程中，大家反映不错，尤其是对里面的“集说”部分最为欢迎，因为它收录了古今中外的许多评论资料，很有利于大家自学时的益思广智、和写作业、写文章时的征引。中年《史记》专家张大可同志曾说此书“体例完备，注文流畅，格式标准，引证丰富，是《史记》选本中最好的一种。”有了读本，讲作品的问题解决了；而轮到综合地论述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时，学生们的记笔记还是非常辛苦的，更无法辅导自学。为此，1985年我又编了一本《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称作“评议赏析”，完全是为了便于征订发行的需要，实际上这是一本“《史记》论集”，是一系列《史记》专题的文章。老专家季镇淮先生曾明确指出：“《史记评议赏析》分为两部分，前为《史记》思想内容的专题论述，共十三题，多有创获，面目一新；后为《史记》作品的单篇举例分析，探讨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以事实说话，不作空谈，与世之赏析文章以空谈为事者不同。此书为专著，是《史记》研究的精华之所在。”以上两书在国内都流行较广，甚至在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书店里都有出售。

尽管如此，我觉得作为教材要求，以上两书还很不尽如人意。《史记选注集说》太偏向于文学了，连《平准书》、《货殖列传》这种经济名篇也没有，因而对于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就深感遗憾，而且即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言，讲《史记》专题也不可能不讲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为此，我对《史记选注集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是增加了“表”、“书”的内容，使之五体俱备；二是增加了有关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篇章，使之反映司马迁的思想更全面；三是增加了“集评”的分量，使之更有利于读者思考、研究问题。此书改名为《史记选注汇评》，

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至于《史记评议赏析》，前面已经说过它是一篇文章论集，根本不是一本有关《史记》的系统教材。作为一门系统的选修课来说，许多课堂上应该讲到，而事实上也已经讲过多次的东西，这本书上都没有。今年春季，北京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处提出要编写一套比较规范的成人教育教材，其中选中了这门已经讲过多年的《史记》专题课。正好，打乱旧的格局，重新另起炉灶，重编一本《史记》系统教材的机会来了。我们对这本新教材的要求是，它既要有关于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的一般知识的介绍，要能让读者从中学到有关《史记》的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尽量吸收近年来《史记》研究方面的新成果，而且也要把我们自己这些年研究《史记》的心得体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这本书既应该有它普及的一面，同时也还要有它提高的一面。要使它能成为一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新著作。由于这本书在讲说、论述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时，照顾得面最全，讲得最系统，所以我们给它命名为《史记通论》。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谅所难免，欢迎专家和读者们提出意见。

韩兆琦

1989.10.于北京师范大学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 司马迁的时代与生平.....        | ( 1 )  |
| 一、司马迁的时代.....         | ( 1 )  |
| 二、司马迁的家世.....         | ( 6 )  |
| 三、司马迁的生平.....         | ( 10 ) |
| 四、司马迁年表.....          | ( 21 ) |
| 《史记》的编修与规模体例 .....    | ( 30 ) |
| 一、《史记》的名称.....        | ( 30 ) |
| 二、《史记》的体例.....        | ( 31 ) |
| 三、《史记》中的互见法.....      | ( 38 ) |
| 四、《史记》记事的断限.....      | ( 41 ) |
| 五、《史记》的散失与补缀.....     | ( 43 ) |
| 六、《史记》是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 | ( 48 ) |
| 司马迁思想管窥.....          | ( 54 ) |
| 一、司马迁的唯物思想与历史观.....   | ( 54 ) |
| 二、司马迁的求实精神.....       | ( 64 ) |
| 三、司马迁的政治理想.....       | ( 74 ) |
| 四、司马迁的民族观.....        | ( 82 ) |

|                              |         |
|------------------------------|---------|
| 五、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 ( 90 )  |
| 六、司马迁的文学观·····               | ( 104 ) |
| <b>《史记》的文学成就</b> ·····       | ( 116 ) |
| ✓ 一、《史记》的写人艺术·····           | ( 116 ) |
| 二、《史记》的悲剧性·····              | ( 130 ) |
| 三、《史记》的抒情性·····              | ( 141 ) |
| 四、《史记》的讽刺艺术·····             | ( 154 ) |
| 五、《史记》的语言成就·····             | ( 163 ) |
| <b>《史记》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与继承</b> ····· | ( 170 ) |
| 一、《史记》与《春秋》·····             | ( 170 ) |
| 二、《史记》与《左传》·····             | ( 174 ) |
| 三、《史记》与《战国策》·····            | ( 181 ) |
| 四、司马迁与先秦诸子·····              | ( 190 ) |
| 五、司马迁与屈原·····                | ( 200 ) |
| 六、司马迁与先秦士风·····              | ( 207 ) |
| <b>《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b> ·····    | ( 217 ) |
| ✓ 一、《史记》与后代传记文学·····         | ( 217 ) |
| 二、《史记》与后代散文·····             | ( 226 ) |
| 三、《史记》与后代小说·····             | ( 237 ) |
| 四、《史记》与后代戏曲·····             | ( 247 ) |
| <b>附录</b>                    |         |
| 研究《史记》的主要参考书目·····           | ( 258 ) |

# 司马迁的时代与生平

## 一、司马迁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又催生了伟大的历史文化！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指出：“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二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最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秉赋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所以赖明德认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①由于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②由于学术文化的从多元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的难求；③由于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了被蹂躏的人性是多么地可怜，被压抑的人权是多么地可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炼天才的社会。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因此，要正确了解和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经济上，

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远远超出了战国时期。司马迁概括这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康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捫而不得会聚。”（同上）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创立于秦始皇，但只昙花一现，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是把诸侯王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朝

廷直辖的土地。推恩诏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所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并探险西域，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概念，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西汉建国以来的文化事业的开放发展也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并不准民间藏书和读书以后，使古代文化濒于灭绝的境地。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指文献资料的搜集情况而言。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首先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接着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宏伟的《论六家要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

马迁的《史记》写作，就是在当时学术方面浓厚的综合工作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汉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社会从古到今发展的全貌，总结历史的经验，作为当时社会的借鉴，起到补敝起废的作用。司马迁适应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述史任务。所以，《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西汉，除了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外，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政论文和辞赋的成就，对《史记》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西汉前期各家政论文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重视总结秦亡的教训，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达的重要内容。在书中，司马迁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实际上就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当时的政论家如贾谊、晁错等人，都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作了肯定，司马迁把这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夫子写《春秋》成“素王之王业”、“为一代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识见外，也是受了贾谊等人的影响，所以他把贾谊的《过秦论》直接附在《陈涉世家》后面作论赞。从文章风格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惮的特点，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史记》文章也显然有这种特点。《史记》以“实录”著称，司马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锐，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无顾忌，文章中洋溢着作者匡时救弊的热忱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汉初散文有时为了讲究文章的气势而常常忽略细节的真实，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加以夸张，这种例子在《史记》中触目皆是，而《史记》文章所以精彩动人，也正和《史记》文章的这种讲气势，重感情密切相关。

从西汉前期开始，辞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散文普遍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迁擅长写赋，本身也是一位辞

赋家，所以《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辞赋的特色。比如《日者列传》从形式到语言，都明显带有赋的色彩。在形式上，《日者列传》采用宋忠、贾谊和司马季主的一问一答来结构文章，这正是辞赋惯用的形式；在语言上，它韵散结合，句式长短相间，音节和谐，抑扬有致，而且重铺叙，多排笔，议论风发，气势磅礴，读来低昂舛节，错落上口，说它是一篇散文赋，是完全恰如其分的。我们认为，《史记》之所以文彩照人，这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鉴汉代散文、辞赋的表现手法及其语言艺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一点，过去人们还不太重视。

以上说的都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一面，是影响司马迁那种积极豪迈、豁达宏伟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随着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统治者物质与精神的掠夺欲望的膨胀，一种为维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出台了，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汉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采取的对策。按照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他们表面上说是尊“儒”，其实这种“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轲，它们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政治作粉饰、作辩护的东西，是最浅薄、最赤裸裸地为汉武帝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货色。“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承，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动摇，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

就正好是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记》中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的。

## 二、司马迁的家世

关于司马迁的世系，历史材料很少，唯一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追述，他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段叙述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司马迁把自己的祖先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他说他们家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他以自己出身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中而自豪。因为他家祖先曾世代代为史官，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担任史官，而害怕这种传统

在他们手里中断。同时，这种世代为史官的家世，还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这种优良的品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以修史为己任，在兴旺发达的汉武帝时代义不容辞地自觉承担起了述史的任务；二是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象齐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那种威武不能屈，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反抗精神，以及他们宁死也要直书的强烈的正义感。司马迁后来惨遭酷刑后，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在司马迁的祖先中，司马错等人作为司马氏家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对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和其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关系。我的朋友张大可同志在论述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司马氏祖先源远流长，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臣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立功名。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垂名于多种典籍之中。《诗·大雅·常武》赞颂了他的事迹：‘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条亦述载此事。从此，休甫之后裔以司马氏为姓，传习兵法剑术，出了好几位名臣武将。《太史公自序》作了亲切的记载。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司马氏，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与白起同时，年齿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个显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白起事秦昭王三十七年。两人友谊深厚，曾并肩作战。秦昭王十八年（前289年），司马错与白起共攻魏，取垣、轵等大小六十一城。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传》、《白起传》等篇记载，司马错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长平战后，秦军分为三路

攻赵。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龁率一军取赵皮牢。司马靳率一军北定太原。公元前257年，白起不肯为将攻赵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连坐而死。白起不肯为将，因为他认为攻围邯郸不能取胜，他宁死也不做败军之将。秦军攻围邯郸，诸侯救赵，果然失败。司马靳连坐而死，由此可见他与白起关系之密切，大约也是不肯做败军之将拒绝出征而被赐死。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些思想和品德在子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身行言教之中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周公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阵的兵学，就这样在《史记》中得到发扬光大。”（《司马迁的战争观》，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第三，在司马迁的先人中，还出现了两位经济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铁矿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有关司马昌和司马无泽的详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既然能在当时做经济官，那么他们自然具备管理经济的专门业务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离司马迁都不算太远，在一个很重视家学渊源的家庭里，他的祖先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及知识，肯定会程度不同地被留传下来。司马迁熟悉各地的物产和市场行情，具有较好的经济头脑，我们认为，这和他从小得到的家教有关，在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似乎应该考虑到这一层因素。

司马迁的家世久远而简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生年未详。他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令的级别并不高，但司马谈很

珍惜这一职务，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并决心坚守这个世业，他经常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为此，司马谈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司马谈的督促和培育下，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等古代史籍，后又向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至于司马迁的壮年漫游，也是司马谈为司马迁以后写史作准备的一次精心安排，和纯粹的游山玩水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个真正的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可以说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融贯古今，兼通百科的大学者。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写了篇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比较公正的评论了各家的优劣长短，而竭力肯定了道德家的学说。《史记》中的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受了乃父影响的结果。《论六家要旨》强调六家并存，认为它们都对治理天下有用，只是方法不同，不可一概废弃，表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继《春秋》以后编纂一部新的历史，司马谈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搜集材料，拟订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最后临终前又遗命司马迁，鼓励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心血的结晶，司马谈的遗嘱，成了司马迁著述的动力之一，《史记》的最终写成，也是司马迁完成父命，怀念父亲的一种表现。